

中国近代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 特点：以梁启超为例

钟祥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人。他的相关论著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参照,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的研究存在着观点跳跃和逻辑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此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延续。文章在方法论的层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新的解析。

关键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特点;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8-0036-10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但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评论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探讨的,尚付阙如。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论著进行梳理,分析其中所反映的方法论特点,然后考察这一特点的学术史意义。

—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就促成原因和知识来源而言,除了日益紧迫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快速传播的外国理论思潮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回顾反思,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饮冰室合集》所收的篇目,梁启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著述主要有:《〈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王荆公》、《管子传》、《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从时间跨度看,这些著述前后相差25年,占据了梁启超思想形成和转变的主要阶段。从研究内容看,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重点在先秦,尤其是《管子》一书,对后来的史料也有顾及。从写作特点看,梁启超运用了逐段按语、人物评述、专题分析、断代史论等多种写法。

收稿日期:2010-05-17

作者简介:钟祥财(1954—),男,浙江宁波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写于 1897 年。在该文中，梁氏所评论的史料仅占《史记·货殖列传》全文的 1/5，而且都集中在前面部分，这表明他对《史记·货殖列传》经济思想的评论是不完整的。《王荆公》一书写于 1908 年。全书共 22 章，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是第十章《荆公之政术（2）：民政及财政》。总体上，梁启超对王安石的经济举措持肯定态度，但在具体阐述中，又常对王氏做法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异议。《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一文写于 1915 年。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财政学说在先秦时期已有成果，但秦汉以后，除《盐铁论》外，该学中断，何以致此？他分析了六个具体原因。《墨子学案》一文写于 1921 年。梁启超对《墨子》的关注时间较长。1904 年，他写了《子墨子学说》，1920 年，他写了《墨经校释》，在《墨子学案》后，他在 1922 年的《先秦主张思想史》中又谈到墨子。就经济思想而言，梁启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子墨子学说》的第 2 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和《墨子学案》的第 3 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中。在前一著述中，梁启超概括了墨子实利主义的三个公例，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归纳了墨子经济思想的七个法则。《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写于 1922 年。在这部断代史论中，梁启超专辟第 20 章《生计问题》，对道家、法家、儒家、墨家等各派经济思想作简略点评。

《管子传》写于 1909 年。虽然早于《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中着墨最多的，产生的理论影响也最大。《管子传》共 13 章，其中第 11 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分六节，分别为：（1）国民经济之观念；（2）奖励生产之政策；（3）均节消费之政策；（4）调剂分配之政策；（5）财政政策；（6）国际经济政策。各节中篇幅最长的是第 4 节，占 12 页（整章共 36 页），其次为第 6 节，占 10 页，再次为第 5 节，占 7 页。总的说来，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思想的阐述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重视国家的作用，其二是关注分配对生产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两个特点折射出当时历史和理论的变化，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切入点。

二

对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的不乏其人。^①梁启超的逻辑矛盾有时甚至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如赖建成在分析梁的《管子传》时指出：“梁认为这种手段（指国家干预——引者）在古代‘盖甚有效也’，因为‘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则于助长全国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然而，‘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困惑：梁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管子》的经济政策，来呼应 20 世纪初期

流行于德、日的国民经济学派的主张,但梁又屡屡说若采行《管子》的政策,则‘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管子所谓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两论对比,梁到底要读者何适何从?”^②“读到此处,我们再度碰到一项矛盾:梁既力扬《管子》经济政策的高明,但接着又批评盐铁专卖政策的严重弊端。‘盐官之置,使人民生事日蓄,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弊;……’”^③“更广义地说,轻重术是《管子》的核心概念,既然‘非完备而可以适用也’,那么梁希望读者从《管子传》得到哪些有用的讯息呢?”^④

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须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如前所述,《〈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是梁氏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第一篇文章,这篇写于戊戌变法以前的文章标志着梁启超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⑤也可以视作他对中国传统思想认识评价的逻辑起点。胡寄窗认为:“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到许多近代经济观点,如经济的世界主义,自由贸易,保护政策,外贸中的物物交换和贸易差额,国内经济的专利权政策,股票买卖等等。而特别要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提到西方的经济循环论如所谓葡萄说,太阳黑子说,可算是国人著作中最早出现的近代经济循环理论。二是他在此文中对崇奢黜俭论作了尽情的发挥”,“总之,《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如不苛求其论述的正确与深入,仅就其所引证的西方经济概念来说,其数量之多在当时的确是惊人的”。^⑥这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前,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较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从《〈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的内容看,梁氏的思想是倾向自由竞争的。如他批评《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论说:“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借以自存也。故言理财之学者,当并国之差别界限而无之,有差别有界限,斯已下矣,若不相往来,又差别界限之下者也。……是率天下而路,皆深陈商学精义,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⑦关于司马迁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梁启超的解释是:“因之”是遵守科学规律,“利导”是专利法等激励创新,“教诲”是设立学校,“整齐”是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对原有利益进行整顿,如漕运改革等,此“自善治财者视之,已为中下策矣”,他特别指出:“与之争者,不思藏富于民之义,徒欲腴民之脂膏以自肥,輓近之计臣,日日策画筹度者,大率皆与之争也。故西人于民生日用必需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特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日之邮政之类者。”^⑧在讲到“积蓄之理”中的价格变动时写道:“天下豪杰之士,每喜创新事业,而中人以下,每甘追逐风气。天下豪杰少而中人多,当每一事业之初创也,必获厚实于群,无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业,实不能容此无量之人,乃不能不争贬其价值以相竞,于是其势必立蹶。而他种事业,因为众人所不趋,必至缺乏,值乃骤进。此上极反贱,下极反贵,

所以然之故。”^⑨

但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又常常受到他思考现实问题的影响。如对王安石，他的正面评价主要基于社会改革(或政治斗争)的角度，^⑩一旦深入到经济政策的利弊，则针砭之意溢于言表。梁启超说：“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盖至为微末。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资者交受其益而莫能以相病，而国家复设一中央银行，以为各私立银行之枢纽，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资，则其道得之矣。荆公之为此，所谓代大匠斫易伤其手也。”^⑪他对市易法也有相似的评论，认为国家直接行使本来由市场主体行使的职能，效果不好，“夫笼天下之货而悉由官司其买卖，即不然，亦须由官估其价值，盖非是而所谓平物价之目的不得达也。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会主义派别所主张条理之一种。顾彼有与之相辅者焉。盖从其说则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与否，犹未敢断言也。若在现今社会制度之下，欲行此制，云胡而可。现今之经济社会，惟有听其供求相剂，而自至于平。所谓自由竞争者，实其不可动之原则也。今乃欲取营运之职，而悉归诸国家，靡论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险，乃将愈甚。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自为兼并者也。夫兼并者之病民诚烈矣，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与之相竞，相竞则可以渐底于平矣。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凡此皆市易法不可行之理由也。”^⑫

这种矛盾在《管子传》中尤为明显。一方面，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现实使他寄希望于政府控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意识又使他对国家干预持保留态度。关于前者，他指出：“夫物价自然之高下，本由全社会公共经济之现象所造成。专其利于少数之人，固已非当，况复以人力而矫揉之，使随己意为高下，而因以制多数人之死命而自罔其利者哉？此虽命之曰盗贼之行可也。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家(国)家还用以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⑬关于后者可以《管子》提出的禁止民间借贷主张为例。梁启超既肯定《管子》能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家掌握金融工具的重要性，同时又表示：“夫富民贷而取重息，诚为朘削贫民之一显弊。有国牧民者，固不容坐视。虽然，贫民之资焉者，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禁贷而绝资，以是为保护贫民，而不知益以困绝之也。若夫以法规定息率，视彼禁绝贷资者，为道固稍进，然贫民之忍重息而举债也，必亦有其大不得已者存。资者多而贷者寡，求过于供，息率势不得不昂。强以法律限制之，则贷者于普通息率之外，

更须索犯法之保险费,然后肯出贷,是欲轻之而反以重之也。故善谋国者不为此下愚之策,惟设法以立完备之金融机关,使一国现有之资本,流通捷而效力增;而将来之资本,缘而增殖,则息率之日下,不期而自致焉,各国现行之政策是也。”^⑩

赖建诚认为:“《管子传》第11章第五节,提到‘德国硕儒华克拿氏’(Adolf Wagner 1835—1917,现译为华格纳)3次,他的著作在19世纪末的日本甚有影响力”,“梁在日本读了他的著作,兴奋之余,以大气力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了管子并藉以论述:(1)若中国要迎头赶上‘大昌于天下’的财政学说,其实不必外求,只要切实施行老祖宗的法宝即可;(2)藉机表明他对德、日国民经济学派的认同,以及对英国史密斯式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能认同。梁的这种立场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德、日、中这类在19世纪中末期尚处于开发阶段的国家,对经济霸权的英国有一种难以认同的倾向。”^⑪笔者以为,华格纳的学说对梁启超某一时期的经济思想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既非唯一的,也非长久的。由于赖建诚在分析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时没有把他对王安石的评价和对《管子》的论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关键的是忽视了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的观念表述,因此觉得梁启超的矛盾难以理解。一个思想家存在理论矛盾并不奇怪,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矛盾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矛盾所反映的更深刻的时代问题。根据本文前面的梳理,不难看出梁启超早年接受的自由竞争理念一直潜在地左右着他的学术判断,以至于他在正面宣传国家干预政策的过程中也会流露出怀疑和保留。

这种情况还可以从梁启超后来的思想变化中得到印证。日本学者森时彦指出:从《管子传》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通过对亚当·斯密作历史主义的探讨摸索到了历史学派学说的梁启超,他所选择的当前的经济处方,是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⑫“不过,这个构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做了修正。如果说,梁启超在大战的惨祸和德国战败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国家主义仅仅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拣起从前的评价来,认为管子、商君书等的‘法家者流之生计政策,无论为重农为重商,要皆立于国家主义基础之上。所谓‘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孟子所斥为民贼也’;甚至更进一步地,对战国时代的霸道和西欧近代的帝国主义政策给予同样的批评:‘彼宗不徒以此(盐铁官营)均国内之贫富而已,更利用其国家资本主义以从事侵略。……而现代列强所惯用之生计侵略政策,亦大率由斯道也。’”^⑬

赖建诚认为梁启超在《管子传》中的矛盾难以理解,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定梁启超在基本经济理念上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在2002年写成的《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一书中,他依据侯厚吉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的研究,把梁启超划入主张保护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一派。^⑭

但这样的概括是值得商榷的。例如,《管子传》云:“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者(Kartell),有所谓托辣斯者(Trust),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①在这里,梁启超抨击的是“过甚”的“自由放任”,而且不忘提醒政府干预“非可骤行于今日”。

由此可见,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时存在的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固然有其治学特点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其基本经济理念和特定历史情境所导致的政策需求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梁启超在研究中运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互相矛盾的方法。

三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探索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体现的方法论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

1982年,巫宝三在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状况时说:“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从本世纪初期才开始。梁启超的《管子传》、《王安石传》和梁启超的学生麦孟华所著的《商鞅评传》是这一时期的著作。”^②后来,叶世昌在《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一文中写道:“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有的学者就联想到中国的情况。首先是梁启超”,“他(指梁启超——引者注)肯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经济学的国家,想写出一部中国经济学史,对中西经济学说进行比较。”^③由此看来,梁启超可能是中国最早具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意识的人。因此,治中国经济思想史者对梁氏的工作向有定评。^④

另一方面,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虽然以西方理论为参照,但本土文化的影响仍然显现。如前所述,梁氏早期接受的西方经济思想是自由竞争,而后又赞成政府干预,最终再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但他的自由经济理念与西方的思想存在差异。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古代君主与国家界限不分明,富国即无异于富君……儒家所以反对富国者,盖在此点。不宁惟是,即如现代所谓国家主义者,其财政虽非以供君主之内府,然亦当‘取诸民有制’。盖有所积重,必有所空虚。积重于君主,积重于人民中之一部分私

人,固不可,积重于国家,犹之不可也。何也?积重于国家,则空虚必中于个人。以国家吞没个人,结局亦非国家之利也。”“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以为国家之职责,惟在‘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碍人民生产力者,或足以破坏分配之平均者,则由国家排除之防止之,余无事焉。如是,听人民之自为谋,彼等自能‘乐其乐而利自利’也。”^⑧

在稍前写出的《墨子学案》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已有微辞。如在解释《墨子》中的“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时说:“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此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⑨在梁启超看来,“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的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的,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⑩

但这种对政府干预的警觉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并不意味着梁启超真正了解了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实质。^⑪对此,张灏曾分析说:“1899年,梁受约翰·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对英国的自由主义有了一个模糊的判断,他将他的一些短文汇编成《自由书》。但直到1902年,在那篇著名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文章中,梁才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接受政府是守夜人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赞同集体主义的看法,认为国家高于政府和人民之上,国家必须被看作有其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国家最高主权的所在。同时接受政府守夜人理论和国家至上理论,表明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⑫“他(指梁启超——引者)指出,在墨子的学说中,爱总是和利连在一起,如果墨子没有作为整体的社会利益的思想,这两种价值观怎样能协调呢?梁认为,这种对公益的热心是以墨子称赏的苦行为基础的。他承认墨子有时也谈到自利,但仅仅是为了使公益思想被那些通常总是忽视它的人普遍接受。因此,自利只有辅助价值。对墨子来说,他最终信仰的无疑是公益的价值观。正是因为公益在墨子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梁称墨学为‘圆满之实利主义’。”^⑬这就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梁启超思想的特点。

正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了更大的

学术史价值。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市场竞争的经济思想，但这些思想之所以未能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潜在的制约因素就在于从秦汉以后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②如马寅初所说：“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例如采矿一事，历代以来，均归国家经营，至明代犹然。他如盐铁等业，亦为国家所专营。可知历代之经济政策，均以整个国家之利益为前提，詎非全体主义之表现哉。”^③唐庆增也认为：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欲使中国而有完善之经济学说者，当废除以家庭为本位之社会，而以培养个人之智力为归”。^④

因此，把中国古代类似于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资源，必然存在重大的局限，导致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国家统制和政府干预主张重复出现。这种现象既出现在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里，也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思想中。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理论时十分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⑤三四十年代，国人论述统制经济的专著大量出版，^⑥而且提出这类主张的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有企业家和政治家。如蒋介石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中国经济学说以人类的理性为本源”；其二，“中国经济学说以社会的全体为本位”。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家，“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之小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他们的目的都是国计民生，都是为国计民生而致力于经济的规划与统制。”^⑦

只有少数人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如唐庆增强调：“放任主义，昔在欧洲盛行，惟欧战而后，遂渐有侧重干涉主义之倾向，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将仿行欧制乎？仰沿用传统经济政策乎？则以旧习惯关系，窒碍难行，抑且遏止人民创造性，阻碍资本之积储，故不必亦步亦趋，效法欧美也。然现代人民，公众欲望，较前为复杂，故现今亦不能完全采取放任之态度。依愚所见及，现时我国应采之经济政策，固宜酌取往昔放任之精神，亦应设法避免干涉之弊窦”。^⑧抗战胜利以后，谷春帆提出：“计划经济，是从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中，谋经济力量之增长。但这是过渡办法。到经济力量增加之时，计划统制的程度，应当一天一天减轻。让渡与自由放任之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经济，全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国防公共工程之类。国家仍要有计划来办理这些事业。但其办理是代替人民处理公共事物，而不是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⑨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学术史现象，梁启超的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深层原因是在方法论上，其学术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不是简单的理

论肤浅或治学浮躁,而是一种文化和时代的制约。当工业文明传入到古老的农业大国时,这种制约无法回避,导致的理论“混乱”并不奇怪,仅仅从技术或政策层面要突破它非常困难。梁启超的个案表明,缺乏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接受政府干预思想是可能的,反对政府干预政策是不彻底的,因而实施自由经济也不可能一以贯之。梁启超的思想特点在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说明文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可以说,只有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巨变和伟大实践中,从方法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时,我们才能对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时体现出来的理论现象作出新的解析,获得新的启示。

注释:

- ①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页。
- ②③④⑤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45页、第247页、第253页、第234、235页。
- ⑥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99页;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6—381页。
- ⑦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 ⑧⑨⑩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之二,第36—37页、第38页、第42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1936年版影印)。
- ⑪“整体而言,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没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诉求是替王安石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鲜明偏颇,在格局上还是没跳出‘党争’式的论述。”(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0页)
- ⑫⑬梁启超:《王荆公》,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七,第74页、第78—79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1936年影印)。
- ⑭⑮⑯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62页、第63页、第62—63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1936年影印)。
- ⑰⑱[日]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第242页。
- ⑲赖建诚:《亚当·斯密与复辟:〈国富论〉与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3页。
- ⑳巫宝三:《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
- ㉑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2—113页。
- ㉒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288页。
- ㉓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专集之五十,第173页,《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

- 局 1989 年版(据 1936 年版影印)。
- ②⑤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第 17、18 页、第 20、21 页，《饮冰室合集》第 8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据 1936 年版影印)。
- ②⑥关于西方经济自由的含义，可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6—7 页。
- ②⑦②⑧[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6—137 页、第 149 页。
- ②⑨参见拙作：《试析 20 世纪 30 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 ③⑩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39 页。
- ③⑪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4 页。
- ③⑫参见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2—323 页；《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5 页；《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53 页；《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21 页。
- ③⑬参见拙作：《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史林》2008 年第 2 期。
- ③⑭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 年版，第 184、187 页。
- ③⑮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1936 年第 7 卷 1 期。
- ③⑯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第 22 页。

Characteristics of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A Case of Liang Qichao

ZHONG Xiang-c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Liang Qichao applied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to his comparative study which provided the condition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bject named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re were some inconsistent views and logic contradictory in his study. This phenomenon still lasts in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 paper gives a new 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methodolog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tudy o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methodology; Liang Qichao (责任编辑 金 澜)